

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匈] G. 卢卡奇*

众所周知，方法论问题在近代科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和解释哲学的各种根本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当前，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加提高了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这些方法论研究的迫切性与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性任务以及提高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关。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各个领域、社会心理学等科学的迅速发展说明，从前曾是“抽象的”、只起解释作用的那些科学越来越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实践，它们渐渐成为“应用”科学，在论证和检验社会决定和政治决定方面起重要作用。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不仅自然科学已经成为生产力，而且社会科学对更高水平上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对长期的战略决策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偶尔还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论研究中有所反映的实证主义传统影响，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影响的表现，是阻碍这些过程的力量。

根据新康德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否定后者有可能阐明规律性的方法论的二元论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发展越发令人信服地表明，无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不以一般哲学观点为指导就不可能取得研究成果。

一般哲学观点对进一步发展社会认识和历史认识的意义日益显著，可以说，在现代的社会研究综合性加强的条件下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从前社会科学中有些学科都是各行其是（这样几乎无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克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对问题进行综合的和跨学科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科学的相互补充和丰富。在我们的时代，不采用社会学精心制定的某些方法，不利用符号逻辑学和数理统计学的成就，就不可能在历史科学、法学、艺术理论方面取得重要的成果。但是，在社会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历史主义原则，越来越需要了解社会的全部完整过程。社会科学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是（自然科学与哲学接近的同时）出现了科学理论、系统分析、信息论方面的研究。这些学科的目标是纯方法论方面的，它们研究某一领域的可能决策，有时是最佳决策的战略。

认为这些科学的出现可能缩小，甚至抵销哲学的方法论职能的这种意见，是不能同意的。最近一个时期的系统分析著作中越来越认识到哲学方面的分析必不可少。

但是，把某些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相互关系说成是，哲学“从上面”给科学指定一些具体的、必须遵守的规范，就不正确了。最近几十年，科学认识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一系列社会科学（历史科学、人种志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受这些科学一体化趋势的影响而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尽管它们的目标具体明确，它们还是超出这些学科的范围并为概括综合创造新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考虑这些新的可能性并广泛利用具体科学的方法论成果，要在自己的概括中（从提出问题、制定研究的“战略”到解决问题时的必要抉

* György Lukács, 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 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

择的选择)重视具体科学的成就和需要,这样才能在发展方法论问题方面前进一大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留下一份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遗产。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和列宁所作的方法论结论:为了我们的意识能够获得充分反映社会的现实情况,应该保持所研究客体的完整性。列宁曾经说过,方法论的完整性原则能使我们避免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就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遗产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认识社会规律时必须采用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提出这一原则并用它来对抗庸俗的进化论,他特别强调人类历史中特殊的和一般的辩证法,强调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揭示了历史进程的深刻规律性,扼要地叙述了历史进程的基本准则。根据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则很重要,即不断克服地理和种族限制的人类历史已逐渐成为普遍的人类历史。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程的基本准则,诸如冲开自然界的局限,由社会共同体的形式代替“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式,是历史方法论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任务。

不间断性与间断性这一对范畴在分析历史进程中起重大作用。辩证统一地运用它们,能使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从而避免使过去的教训机械地运用于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历史看作是辩证的决定过程,必然性和偶然性、绝对的和相对的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前提,阐明这一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旨在进行相应的革命行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都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不把人、人民群众简单地视为历史过程的消极被动的材料,而是把他们视为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体,主体不仅是自己历史剧的作者,也是表演者。

重建社会现实逻辑的必要性是与辩证法中历史主义原则相互联系的。社会科学也象自然科学一样,不应用最高度的抽象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学中使用最简单的抽象、同一与差异的抽象,应特别谨慎,因为只有重视众多因素的理论才能避免把所分析的对象及其发展的规律庸俗化。

知识的数学化过程和符号逻辑的利用加强了社会科学中所谓的语义抽象和形式化的作用。但是,形式化要求重视社会现实各种现象的特殊复杂性,因此,具有一定的限度。阐明这些限度则是方法论的重要任务,在这些限度的范围内,形式化和语义抽象才不是荒谬的。

近十五年来,由于我们重视方法论问题,举办过许多讨论会。例如,社会规律性特征的讨论就有方法论方面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在讨论过程中曾得出一个结论,即特殊形式的社会规律性包括普遍性因素。这个结论是解决研究与一般方法论并列的社会认识方法论问题以及具体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结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提出有关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通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相互联系的讨论,使得社会认识的经验方法及其哲学上的解释更加明确,虽然形式不同,但是相辅相成。只有经验方法和哲学方法统一起来,科学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哲学家、历史学家(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学家),特别是文化史学家详细地阐述并热烈地讨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范畴。结构分析的实质以及批判结构主义的问题也在匈牙利引起热烈的讨论。讨论历史主义和反历史主义时,关于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相互关系问题成了争论的中心。争论的过程表明,结构描写本身,追求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采用模式与辩证地运用历史性原则并不矛盾。毫无疑问,系统分析是现代科学分析的重要因素。同样清楚的是,不

可能把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截然分开。讨论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应该在自己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研究方法。

* * * * *

根据匈牙利社会科学现状以及前面谈到的那些基本观点，集中探讨下面两个方法论问题：1. 社会科学的方法中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历史性和系统性的辩证统一；2.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认识论基础。

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之一。分析历史和逻辑的辩证关系时，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只有把社会作为发展中的有机整体来描述，才能认识社会。自然，社会发展形式的这一经验历史与抽象概念不完全吻合，抽象概念中反映这些形式的本质特征。社会一历史存在以及反映这一存在的那些范畴，不是用进化论观点解释的某些相同现象，马克思的这个意见，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研究中应考虑到，研究对象是现实存在的，各种范畴则反映某一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因此，科学应本着，即使对于它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也绝不是始于它对它们进行研究之时。同时，按照各个范畴出现的先后次序来分析它们也是错误的。相反，马克思强调指出，我们进行分析时，不是根据预定的连贯性，而是根据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中那些将要彼此对立的关系的完整性。

对社会主义各发展阶段进行哲学一方法论方面的分析时，我们不能不考虑马克思在分析比较简单的范畴(历史上出现比较早的)和比较复杂的范畴之间的辩证的、历史一逻辑的相互联系时所说的那些思想。这就是，只有在分析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才有社会存在的最一般的抽象。虽然正是由于自身的共性，抽象范畴才被用于任何时间，但它们既有抽象性，又有历史规定性，它们只表现在具体范围内。例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概念时指出，只是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普遍性质才开始明显化。

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对社会科学起革命化的作用。它们要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研究社会生活，因此促使研究思想作出关于社会未来情况的有科学根据的结论。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生产方式时，特别突出了那些指明社会从前状况的、使研究者不得不研究历史上更早的各种生产方式的方面。马克思研究存在事物的方法，要求同时分出被分析的现实的一些方面，即有迹象克服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并且勾画出未来轮廓的那些方面。换言之，历史和逻辑的辩证法是研究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共产主义发展前景的哲学一方法论基础。

在自然科学中广泛使用理想化的抽象(理想化)，它能从逻辑上重建所研究客体的内在的相互联系。诸如发展生物论、古生物学、宇宙起源论等等自然科学学科，也把作为发展概念有机部分的历史性因素列入自己的研究客体。但是，只有在社会科学中，历史方面的和逻辑方面的辩证统一才真正体现出来，并成为顺利进行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我们也不应把这些方法估计过高。社会科学不能没有真理的具体性原则和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

社会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如何确定社会事实和某部门科学的理论基础的相互关系？定量对描述社会事实、阐明大量的周期性现象，特别是用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中起何种作用？如何确定定量和形式化的适用性范围，解释各类社会科学的特有的方法以及它们的逻辑结构是什么？社会科学专业语言的特殊性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社会科学中交流思想的可能性及其障碍是什么？社会科学研究中唯物主义的社会一历史方法的启发职能和价值职能是什么？除弄清楚这些问题外，阐明分类和系统化原则也是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研究的任务。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分类和形式化的理论基础、认识方面、标准等重视不够。

(知 英摘译自苏联《哲学问题》1981年第1期)